

关于南唐的统一方略及其流产

王 永 平

提要 唐宋之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日渐南移及诸多割据政权的兴起,南方地区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与扩大。基于这一宏观把握,本文较系统地论述了南唐政权在五代后期统一进程中的具体活动,以为南唐先主统一方略的制定与中主对南方诸地的规划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开始,从而给所谓当时南方地区的“政治自觉”这一论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证明。

唐宋之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全国经济重心的日渐南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文化的嬗变,给南部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以往研究当时南方地区社会发展,总是列举人口增殖、土地开垦的数据来说明。这固然很重要,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人获得完整的认识。从五代后期的统一进程来看,一些南方割据政权明确提出了规划全国的统一方略,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这表明在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南方地区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和扩大。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南唐政权在当时统一进程中的作为的细致分析,以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保境息民政策与南唐国力的上升

937年李昇在杨吴政权的基础上创建了南唐政权。其国力较盛时,辖区“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1],为当时南方地盘最大的割据政权。

李昇立国之际,全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在北方,石敬瑭依靠契丹的支持建立了后晋政权,进一步恶化了北方的局势;另一方面,契丹占据了幽云十六州,并不断骚扰中原,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此同

时,南方诸小国渐呈衰势,有的已腐败不堪,难以继续维持割据局面。这表明统一因素正在不断壮大,统一趋向已初显端倪。对此,李昇从长远利益着眼,审时度势,继续推行保境息民的国策,从而维护了南唐的稳定,为其国力的进一步增长创造了条件。

江淮地区在唐末军阀混战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史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2]杨行密建立吴政权后,推行保境息民的政策,使江淮地区获得了相对稳定;同时又注意整饬内政,“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3]。此后,权臣徐温继续维护这一政策,注意睦邻友好,减少战争与耗费。当时吴与吴越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时有冲突。919年徐温于无锡大败犯境的吴越军队,时值大旱,吴越水师处于挨打的困境。吴国将领请求“尽车徒之势,一举而灭之”,徐温说:“天下纷纭,民甚困矣;钱公(指钱鏐)亦未可轻也。……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其势不得不服,使两地之民各保室家,……多杀何为?”^[4]从而避免了双方旷日持久的战争。

李昇自918年主政广陵(今扬州市),逐

渐控制了吴国的中枢实权。他执政期间,进一步推行了保境息民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称帝后仍一再告诫群臣说:“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5];曾严肃地斥责主战的元老重臣宋齐丘等人,说:“讨伐之议,愿勿关白”^[6]。一次吴越都城杭州遭火灾,国主钱元璿惊悸而死,南唐文臣武将纷纷主张乘机开战,李昇说:“疆域虽分,生齿理一,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戮,朕所弗忍,……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7]于是遣使慰问,“厚遗之金粟缙绮,盖车相望于道焉”^[8]。这就抑制了日益增长的战争情绪。

保境息民政策的有效推行,给吴和南唐带来了较长期的社会稳定,从而使李昇主持的社会改革得以顺利实施,使南唐的国力呈现出稳定上升的势头。正如文献所载,自李昇辅吴“为左仆射参大政,于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时四境安定,惟越人为梗,主不欲浹武,专务安辑,遂许和好。戢兵薄赋,休养民力,山泽所产,公私同之。戢扰吏,罢横敛,中外之情,翕然依附”^[9]。其中难免虚夸修饰,但诉诸史实,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昇的业绩。943年李昇去世时,仅金陵(今南京市)德昌宫就“储军器金帛七百万”^[10]。南唐的文化事业也有长足的发展,享有当时“文物最盛处”的赞誉。

据上述可知,经过杨行密、徐温和李昇三代相承的保境安民,江淮区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明显增强,这是当时各割据政权都望尘莫及的。这使得南唐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以致在五代后期的统一进程中,首先由南唐统治者提出了较成熟的规划全国的方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新的历史现象。

二、南唐先主李昇制定的统一方略

随着南唐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南方诸小国的渐趋衰弱,南唐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批主战的文武臣僚,要求对南方诸国发动兼并战争。一时间“大臣议广土宇,往往皆以当自潭、越始”^[12]。对这种狂躁情绪和近视的战略主张,先主李昇采取了严肃的压制态度,坚决贯彻保境息民政策。当然,这时李昇的所谓“保境息民”,与杨行密和徐温的时代相比,已有了一定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味地维持地方割据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了突破割据,以求得进一步发展的新内容。

做为当时一流政治家的李昇,对时局有其独到的认识。他敏锐地体察到了初显端倪的统一趋向,并在战略上进行了富有预见性的深刻思考。他对宋齐丘等人急于用兵南方诸国的建议“皆不以为为”。为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明确共同奋斗目标,李昇召集群臣,举行了一次战略研讨会。以冯延巳为代表的江淮土著地主集团人物公开主张用兵南方诸国,轻狂地以为,只要南唐军令一下,南方各地便会成为囊中之物。对此,李昇提出了自己的统一方略。他首先驳斥了冯延巳等人的主张,以为这样南唐必将遭到诸国的联合抵抗;即便偶然取胜,“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他指出,对南方诸国应“结之以盟诅,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为守”,使其互相牵制,从而稳固后方;南唐应利用这种良好的外部条件,继续推行社会改革,“宽刑平政”,发展生产,训练兵旅,以待时机。最后,李昇指出一旦“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以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僭伪,宁义旧邦,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13]。这就是李昇提出的规划全国的方略。概括地说,就是在保境息民基础上壮大国力,待机北上,进而统一全国。他以为能否控制中原是统一全国的关键。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他把这一战略的实现寄托在“中原忽有变故”的预想上是

否有些荒唐?仔细分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知道,当时北方的后晋政权的统治有如沙上建塔,很不稳固。石敬瑭甘作契丹的儿皇帝,大失民心,一些军阀人物想做石敬瑭第二,有的则恃强叛乱。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便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14]同时,契丹不断南进,窥视中原,其用兵已在旦夕之间。这势必造成一场民族战争与军阀混战。这就是李昇所预料的“中原忽有变故”。果真如此,李昇打出恢复李唐的旗号,领兵北上,是会有所作为的。

也许人们还有这样一个疑问:李昇如举兵北上,南方诸小国会不会乘虚而入呢?从当时情况看,楚和闽两个政权内讧不断,国力颓丧,已完全丧失了对外用兵的能力;吴越虽还算稳定,但其军事力量弱小,对南唐难以构成威胁。譬如在南唐后期国力大衰,屡为后周攻败时,吴越曾“伺间侵常州”,南唐将领柴克宏率素无训练的“羸卒数千,以“戈甲皆朽钝”^[15]的武装,竟大败吴越军队。据此,可以说,在南唐强盛时,吴越绝不敢轻易冒险攻击南唐;即便胆敢这么做,结果也必将失败。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李昇的统一方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可行性。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但他晚年笃信道教,943年因过度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时年五十六岁。临逝前依然念念不忘毕生奋斗的事业,“啖齐王(李璟)指,至出血,属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16]他把统一事业托付给其后继者李璟。但是,李昇的这个遗愿未能实现。

三、南唐中主兼并南方诸国的失败

南唐中主李璟“承烈祖勤俭之后,国家富给”^[17]的遗业,本应有所作为。但他被身边的一帮急功好利的文臣所操纵,他们放言

高论,不务实际,“多自谓国势崇盛,如举泰山以压朽坏,荡定之期,指日可俟”^[18]。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李璟昏昏然,不知所措,以致竟置先主李昇的遗嘱于不顾,迫不急待地发动了兼并南方诸国的战争。

(一)兼闽战争的失败

割据福建一带的闽政权自王审知死后,内政渐坏,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害。944年巡察江西的南唐枢密使查文徽是个主战派代表,他上书李璟,劝其派兵攻打福建,“盛言必克”^[19]。同年底,南唐兴兵攻闽。起初,当地百姓“厌王氏之政,伐木开道以迎唐师”^[20]。但查文徽一介文士,临阵怯敌,被王延政打败。955年南唐派大军增援,攻占了建州,汀,泉,彰三州表示归附,只有福州守将李仁达不降。这种形势本来对南唐有利,各路将领如同心协力,福州指日可下。但宣谕使陈觉争功,想劝降李仁达,以收“不劳寸刃,尽得闽地”^[21]之功。但见李仁达,竟“气折,不敢言”^[22]。返回后矫诏发动大军进攻福州。但陈觉、冯延鲁、魏岑等“各欲功在己,不相应接,偏裨莫敢用命”^[23],从而贻误了战机。不久吴越军队从海路入闽,联合李仁达内外夹击,大败南唐军队。此役,“诸军大溃,死者万计,委军实戎器数十万,国帑为之虚耗”^[24]。950年镇守建州的查文徽偷袭福州,遭到伏击,全军被俘、歼,其本人也做了吴越的阶下囚。至此,兼闽战争彻底失败。南唐在闽与吴越的联合抗击下,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是南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二)经营中原良机的丧失

南唐先主李昇死后的第二年,即944年,中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契丹主耶律德光发动了对后晋的战争,946年灭后晋,并一度于中原称帝。广大北方人民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抗击契丹军队。淮北一带的百姓请求南唐北伐。当时南唐仿佛成了汉族

的“正朔”所在。后晋将领皇甫晖、王建等投归南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这一局势给南唐经营北方提供了最佳时机。而对“中原无主，寇盗纵横”的情形，韩熙载上书李璟，说：“陛下有经营天下之志，今其时矣。若戎遽归，中原有主，则不可图矣”^[26]。但李璟深感国力不济，哀叹道：“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国乎？”^[27]只得眼睁睁地错失了这一良机。对此，李璟时常痛悔不已，曾自责说：“孤不能因其危运，命将兴师，抗衡中国，恢复高、太之土宇，而乃劳师于海隅，孤实先代之罪人”，以致“悔恨百端，不能自弭”^[28]但他醒悟得太晚了。

(三)楚地的得而复失

自马殷死后，割据今湖南及湖北、广西部分地区的楚政权内争不断升级。950年南唐将领何徽洙应朗州马希萼之邀，卷入楚国内争。951年南唐派边镐乘机入楚，兼并其地。但南汉政权也乘机北进，与南唐展开争夺，并在郴州击败南唐前锋部队。边镐“政出多门，优柔不断，纪纲日乱”^[29]，无法有效控制湖南的局势。李璟本想乘早撤军，但冯延巳以为“本朝出偏师平一国，宇县震动。今一旦三分弃其二，伤威毁重，非所以示天下”^[30]，怂恿李璟继续战争。但如何才能胜利呢？他毫无办法，甚至“不欲缘军兴取资于国，以损其功，遣使于长沙，调兵赋，苛征暴敛，重失民心”^[31]，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对。952年以刘言为代表的湖南土著势力在军事上击败了边镐，迫使其退出楚地。此役南唐以“义师”入楚而终以败军被逐，确实“伤威毁重”。

(四)南唐统一活动的终结

当南唐陷入并楚战争的泥淖之时，中原的局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951年郭威建立后周政权，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使国力日益增强。南北方政权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声威的差距逐渐拉大。951年郭威下诏，说：“朝

廷与唐本无仇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无得纵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32]这就摆出了天下之主的身份，取得了舆论上的优势。951年4月，淮南发生饥荒，灾民纷纷入周就食，郭威特诏令沿淮将士说：“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浦无得禁止。”^[33]953年7月，淮南再度遭灾，南唐发兵阻止饥民渡淮，但“民与兵斗而北来”^[34]。国势盛衰和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然而，就在这一形势下，南唐内部竟出现了“议事者多议北伐”的奇谈怪论。高唱此论者，多是早先极力主张用兵南方诸国的江淮土著地主代表人物，真可谓哪壶不开提哪壶。952年南唐派兵援助后周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叛乱，在沭阳被击溃。这表明南唐根本不是后周的对手，问鼎中原更是痴人说梦了。正如韩熙载所言：“北伐，吾本意，但今已不可。郭氏（指郭威）奸雄，曹、马之流，虽有国日浅，守境已固，我军妄动，岂止无功邪？”^[35]李璟也深感元气大伤，于是“议弭兵务农”。有人进言：“愿陛下十数年勿复兵”。李璟答曰：“兵可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36]这说明他对兼并战争已感绝望，企图回过头来，重温保境息民的美梦。但时过境迁，保境安民的特定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了。随着后周的崛起和强大，新的历史统一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955年后周世宗柴荣发动了对南唐的战争。958年南唐屈辱求和，献出了江北十四州之地，李璟则“去帝号，称国主，去交泰年号，称显德五年”。从此，南唐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直至937年被北宋灭亡。

四、对造成南唐统一方略流产的两点内因的分析

我们所说的南唐统一方略的流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指中主李璟对先主李昇制定的统一方略的否定与破坏；其二指李璟时期

对南方诸国兼并战争的失败。因此,分析其流产的原因也应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

众所周知,如欲统一天下或规划某一区域,没有整体的战略指导与缜密的军事准备,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李璟、宋齐丘、冯延巳等人非但置先主李昇的方略于不顾,反而仓促地发动了对南方诸国的战争,结果以失败告终。当然,我们并不蛮横地以为按照李昇的设想行事,就一定能成功。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李璟会轻易改变先主的方略?仔细考察南唐历史,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

南唐的党争,其牵涉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大,都是非常突出的。陆游《南唐书》卷4《宋齐丘传》记载:“当是时,(宋)齐丘、陈觉与冯延巳、冯延鲁、李征古、魏岑、查文徽为一党,(韩)熙载与李晟、常梦锡、萧俨、江文蔚、李德明为一党。”检索文献可知,两党人物是以地域差别而分野的。宋党人物是江淮地主集团的政治代表;韩党人物则为侨寓人士的政治代表。两党为各自集团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倾轧。

我们知道,唐末以来,吴和南唐相继立国江淮地区。随之崛起的江淮土著地主集团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性与排他性,既要求垄断地方政权,又急于向外拓展领地,贪婪地追逐功名和财富。

适时,北方大批士大夫人物南迁江淮。史载:“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李昇“豫使人于淮上资以厚币;既至,糜之以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而至者无虚日”。^[38]这些侨寓人士多为世族地主人物,遭遇坎坷,在政治上比较稳重,怀有远大抱负。如韩熙载南来时,对友人说:“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39]他们是李昇保境息民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并直接参与了其统一方略的制定。但由于他们客居他乡,组织显得松

散,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和软弱性。

由于这两大政治集团存在如此严重的差异与分歧,双方围绕着统一方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先主李昇时期斗争已经出现。李昇早年生长于北方,在思想感情上与侨寓人士自然较亲近。为打破土著人物的包围与控制,他有意识地大力提携侨寓人士,以限制土著势力的膨胀,对重臣宋齐丘拒绝其用兵主张,甚至“由是收权卫之柄,因黜之以远其惑”。^[40]这样,李昇时期基本上维持了两大集团的政治均势和社会稳定。但中主时期皇权的调谐与平衡的能力渐弱,土著集团控制了中主。李璟本人自幼深受南方文化的熏染,是个填词赋曲的好手,自然与土著文人情投意合。李璟执政后,迅速起用宋齐丘、冯延巳等人,造成了土著势力对南唐中枢实权的垄断。史载:“及宋子嵩(齐丘)用意一变,群俭人乘资以聘二冯、查、陈遂有五鬼之目,望风尘而投款者,不可胜数。”^[42]他们专断朝政,为所欲为,甚至“躁妄专肆,无人臣礼”^[43];一度企图废黜李璟,“以国事一委宋公(齐丘)”^[44],可见宋党之嚣张。与此相反,侨寓集团的政治影响大为削弱,基本上被挤出了决策圈。他们的代表人物韩熙载只得沉湎于酒色之中,以保全性命。这样,土著地主集团为扩张领地夺取财物,便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李昇的统一方略,迅速地向南方诸国发动了战争。

那么,李璟时期对南方诸国的兼并战争为何一再遭致失败呢?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以为其直接原因是南唐重文轻武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唐末以来,武人逞强,蔚为风气。江淮地区也如此。史载:“自杨氏淹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类以威势相高,平常居斋几之间,往往斩伐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不识点划,几乎不能提笔者。”^[45]有鉴于此,李昇为整饬吏治,纠正时弊,着力倡导文教,提携文士。从社会效果看,当时

南唐的文人政治基本上是健康的。李昇所信重的文士多是有练达干才的能人,可称之为“文吏之士”,而非那些吟诗填词的“文义之士”。但李璟执政后,一味地宠信“文义之士”,不仅轻视武将,也讥讽那些“文吏之士”。使文人政治走上了歧途,从而日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这在战争的时代里是注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

中主时期,一批“文义之士”不仅操持了朝政,而且完全控制了军事决策权和领兵指挥权。做为最高军事机构的枢密院,一直由陈觉、李征古、查文徽、魏岑等人把持。这些巧于应答、填词赋曲的能手,却是军事上十足的蠢材。典型如冯延巳,“初以文艺进,实无他长。纪纲颓弛,吏胥用事,军旅一切属边帅,无所可否。愈欲以大言盖众而惑人主,至讥笑烈祖戢兵,以为齷齪无大略”^[46]。考察南唐的军事活动可知,对外用兵一般或由文臣挂帅指挥;或虽由武将领兵,实由文臣充任监军使加以控制。可以说,南唐军事上的失败,多是文臣瞎指挥的结果。前述兼闽之役,该胜而不胜,完全是陈觉、冯延鲁、查文徽和魏岑等人导演的一出闹剧。李璟曾委派魏岑、查文徽两人以监军使的身分督促李金全北上声援后汉河中李守贞叛乱,但他们竟不知“河中在何处”^[47],令人哭笑不得。即便如此,他们照样对将领横加指责,甚至不惜陷害。如后周进攻淮南时,南唐大将朱元援救寿阳,但监军使陈觉“妒其能”,“屡表元学术纵横,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48],逼使其一气之下降周。对此,韩熙载曾指出:“出师,大事也,当先正名。莫信于亲王,莫信于元帅,安用监军使哉!”^[49]这段话既指出了监军使的危害,也指明了重文轻武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综括全文,我们对南唐的统一方略及其对南方兼并战争的失败进行了简略的评述。需要申明的一点是,这篇短文并不想从狭隘

的“乡土意识”出发,以论辩南北方之短长,我只想从政治史的角度入手,给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论题提供一点事实。除南唐之外,楚和后蜀也在契丹灭后晋时,或提出了用兵中原的设想,或展开了争夺关中的军事活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地理的变化。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此外,从五代后期的统一进程看,南唐先主李昇的统一方略的明确提出,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开始。南唐中主对南方诸国的兼并战争,尽管成就有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后周和北宋的统一事业减轻了阻力,从而成为总的历史统一进程的一部分。从上述两个意义上说,南唐的统一设想与兼并活动确是极富认识价值的历史现象。

[1]《旧五代史》卷134《李璟传》。

[2][3][32][33][34]《资治通鉴》卷258、259、290、290、291。

[4]《九国志》卷3《徐温传》。

[5][6][7][8][11][12][13][17][18][41][44]《钓矶立谈》。

[9][40]《玉壶清话》卷9《南唐先主传》。

[10]《陆氏南唐书》卷1《烈祖本纪》。

[14]《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16][38]《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本纪》。

[19][20]《十国春秋》卷26《查文徽传》。

[21][22]《陆氏南唐书》卷9《陈觉传》。

[23]《十国春秋》卷22《王建封传》。

[24]《十国春秋》卷26《冯延鲁传》。

[25][27][28]《江南野史》。

[26][35][48]《陆氏南唐书》卷12《韩熙载传》。

[29][36][37]《陆氏南唐书》卷2《元宗本纪》。

[30][31][45]《陆氏南唐书》卷11《冯延巳传》。

[39]《十国春秋》卷28《韩熙载传》。

[42][43]《十国春秋》卷20《宋齐丘传》。

[46]《十国春秋》卷24《李金全传》。

[47]《陆氏南唐书》卷12《朱元传》。

(责任编辑 钱 澄)